
论当代浙商精神的科学内涵

林吕建 唐玉

【内容提要】人类精神的发展总是因民族、国家和地域差异，而表现出强韧的稳定性和文化多元性。浙江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浙商精神既传承与沿袭了优秀传统基因，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本文用史、论、实结合的方法从浙商精神历史文化基因、浙江精神的时代展现、当代浙商精神的现实内容以及浙商精神与浙江文化、浙江精神的内在统一性角度，从整体上揭示了浙商精神的时代特征、科学内涵和演进线索，展望了浙商精神在浙江转型升级、科学发展中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浙江文化 浙江精神 浙商精神

作者林吕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唐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25）

人类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是凝聚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精神一方面因民族、国家和地域的差异，表现出强韧的稳定性和文化多元性；另一方面，各种不同的文明精神也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背景之下，造就了浙江人民兼具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锤炼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励志图强的生活气度，砥砺了浙江人民厚德崇文、创业创新的精神品格。浙商精神在浙江文化的滋养和培育下，既实现了优秀传统基因的传承，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久弥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激励着浙江商人励精图治、开拓创新。

一、浙商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

传统浙商的文化基因，是指浙江历史上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个体特质（素质、修养和信仰等）及其相互联系在商人这一主体身上交织后表现出来的主观属性和特征。学术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浙商的商业实践和思想观念，因此传统浙商的文化基因既折射于学术文化思想传统之中，又通过学术文化思想史的发展而不断繁殖和蜕变。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钱王世家的“保境安民”，知府林启的“讲求实学”，叶适为代表的“务实而不务虚”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义利双行”的永康学派，黄宗羲的“工商皆本”，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王充强烈的批判精神，以及王阳明的开拓创新思想等等，都促成了传统浙商的基本文化因子，为当代浙商精神的发展和演进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1、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反动。大多数传统浙商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生计艰难，不得不放弃农耕或背井离乡，走上经商之道，他们大多拥有朴素而坚定的基本理念，即“百姓日用即为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百姓人伦日用看作“道”，主张“无欲则无心”、“人则财之本”皆是出于对血肉之躯的尊崇，是对自我的肉体存在与人格尊严的维护。这种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实际上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事实性否定，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等典型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彻底反动。

朴素的人本观念是传统浙商创造商业文化的人文基础，深沉的救世情怀和人文关怀体现其中，并具有批判、变革、启蒙的精神实质。例如东汉王充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讖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抨击，主张认识必须以事实为对象，同时以效验来证明，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学的束缚，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悬空思索”，对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大加肯定。南宋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强调学术与事功的统一，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

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人本观念是浙商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客观上，人本观念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有利于提升工商业的社会地位，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为传统自然经济通往近代的商品经济架起桥梁，并成就了浙江特色的“民本经济”。在历史上，传统浙商立足百姓生活，发展专业技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形成了区域性的“百工之乡”产业传统。如东阳的泥水木匠、永康的铁匠、义乌的麦芽糖艺人、奉化的“红帮裁缝”、台州的绣花女、温州的皮鞋匠、永嘉的弹棉花郎等。这些世代相传的专业技能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百姓吃饭穿衣等头等大事，创造了传统浙商的一代代辉煌。

2、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价值传统

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主张要“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大力倡导“四民平等”的新观念，认为“古者四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的区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便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扩大商业精神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反对歧视商业的本末观，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这种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也体现了其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的相左和违背，形成了传统浙商强烈的求富意识和本末并重、趋利尚贾的社会习俗，对浙江的工商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唐代开始，杭州、宁波和温州就已经成为了繁荣的商业都市。两宋以来，浙江成为全国工商业的重要中心，丝织、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都居全国领先地位。

对于义和利的理解，传统儒家思想一直主张重义轻利，这种思想意识在整个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在浙江这块商品经济繁荣，商业文化发达的土地上，思想家、经济学家们却普遍倡导义利并举。在兴利富民的理念中，讲义守信的品德操守始终贯穿其中，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逐渐形成了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儒商文化。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强调“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农商相补。叶适也明确反对义利两分，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提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治国理念，要求“实政与实德双修”，把仁义道德落实到“民利”上。

3、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

自古以来，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七山一水两分田使得煤、铁、油等大宗工业原料均相对匮乏。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造就了浙江人自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实干精神。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复国雪耻，成就霸业。汉代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不断南迁，生存压力日益沉重，浙江人靠辛勤劳动，形成了一年三熟的稻作文明，也磨炼出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同时，古代农业的发展还离不开海堤、河道、水利工程的修筑，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就是一代代浙江人励志图强改造大自然的骄人成果。另外，农耕困难激发了浙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先民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人口密集也在客观上迫使浙江人勇敢地外出谋生，漂洋过海闯荡世界。

靠山临海的多样性地理环境，孕育了浙江人既具有山里人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韧劲，又具备海滨人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胆略。早在先秦时期，浙江就同东亚、南亚、西亚等地区及国内沿海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北宋时期，杭州、宁波、温州均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浙江盛产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元代在全国七地设立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浙江占四个。地理上的多样性与开放性，造成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相互激荡，形成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塑造了浙江人既脚踏实地、坚忍不拔，又敢闯敢干、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4、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浙江的文化传统为“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其中，“人性柔慧”即指浙江人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的特质。在原始积累时期，民间商业精神遭到政治制度的压制，并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触，在这种不利的制度环境之下，传统浙商灵活多变地创造出了独特的“民商”模式，通过寻找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经济缝隙中的“小本生意”，避开与官方利益的直接冲突，以曲折的方式追求商业利润。随后，又通过在农村、城镇、山区的商业“游击战”形式，逐步编织商业网络，使得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徽商盛极而衰之时，传统浙商却得以薪火相传，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获得新生，并最终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主干力量。

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的交织，一方面成就了传统浙商的开放心态和开拓热情，另一方面也培育了传统浙商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特别是近代工商业的兴起，新式教育的开办，西方文化的传播，都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触到了外来文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培育出了乐于接受新事物、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同时，还有大批浙江人到海外谋生，凭借较强的适应能力迅速在异地站稳脚跟，不仅将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也通过华侨的纽带功能不断吸引着外来文化。

二、当代浙商精神的多样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精神所秉承的优良传统基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以激活，最终蜕茧成蝶为当代浙商精神。改革开放的阳光和雨露，孕育和滋养了当代浙商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创举，磨砺和锤炼了当代浙商精神；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积极经验，丰富和升华了当代浙商精神。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开始总结、提炼和概括浙商精神，以促使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升华。就目前研究现状看，有学者指出了当代浙商精神体系的三大主观要件：求富意识、创新意识和学习意识。从浙商精神的内涵和要素来看，现有的概括与提炼大致是从两个阶段进行的：创业期和守业开拓期。创业期的浙商精神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炽烈企业家精神”，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而守业开拓期的浙商，主要是通过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稳定持续地保有自己的商业成果，并使之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一、创业期的“四千精神”目前，创业期的浙商精神被形象地概括为“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道尽千言万语、想出千方万法”。这种精神反映了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时期社会物质财富匮乏、总体科学技术水平低下、计划经济烙印影响深厚的经济背景和“一缺技术、二缺资金、三缺人才”的客观条件，是对“生存型创业”的真实写照。

“走遍千山万水”描述了当代浙商善于经商，敢于闯荡江湖，不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打天下的精神。好男儿志在四方，只有不畏艰辛、跋山涉水，方能闯出一片新天地，他们不搞“窝里斗”，却在经济的扩张中不断向外“攻城掠地”，把“走出去”作为重要的商战策略，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历经千辛万苦”，概括了出身低微的浙商不怕吃苦，勇于吃苦的精神品质。今日吃得苦中苦，明日方为人上人，只有在经受千辛万苦的磨难之后，才能取得令人仰慕的辉煌业绩。类似的概括还有“两板作风”即“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以及“蚂蚁精神”，都充分展现了不畏艰辛的吃苦精神和奋斗精神，也是当代浙商在创业期艰难条件下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道尽千言万语”，意指浙商不仅能够苦干、实干，更善于巧干。他们大多具备精明的头脑，具有坚持不懈的韧劲，善于说服对方和推销自己。灵活的头脑，善于言说的嘴巴，再加上诚实守信的商业作风，为他们打开市场的大门，结交天下商业伙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想出千方万法”，体现了当代浙商多种多样的商业技巧，他们采取“以小搏大”、“借船出海”、“借鸡生蛋”、“戴帽穿靴”、“信誉订单”等各种商战谋略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赫然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发展历程。这种灵活多样的思维方式和坚持不懈的执着，是当代浙商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也为他们在守业开拓期的辉煌搭建起一个稳固的、较高的起飞平台。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十一五”以来，浙江省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创业期的特定经济背景和“三缺”的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改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四千精神”的基础上，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发展出了“新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拓展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这一新发展也是对浙江从“生存型创业”到“创新创业”转型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守业开拓期的精神概括

守业开拓期的浙商，主要是通过艰苦奋斗和改革创新，稳定持续地保有自己的商业成果，并使之进一步巩固与扩大。这一阶段的浙商精神具备求真务实、大胆创新、灵活变通、理性包容、讲义守信等要素，大体已经被概括为勤奋务实的敬业精神、灵活创新的变通精神、抱团合作的团队精神、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四项主要内容。

勤奋务实的敬业精神，主要是指浙商在创业守业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吃苦耐劳的隐忍精神。与“四千精神”相一致，吃苦耐劳的隐忍精神主要体现的是新浙商群体不畏艰难险阻、历经艰辛，在困难面前百折不挠、执着前行，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认清目标不动摇、抓住机遇不放松、坚持发展不停步。这也与“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浙江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勇于拼搏、奋发图强、走在前列，既是当代浙江人的历史使命，更是新浙商的宏图大志。务实精神主要是指贴近实际、注重实干、讲求实效。“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孕育了浙商不尚空谈，不喜坐而论道的务实性格，崇尚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注重实际的行动和实际的效果，具有强烈的实干精神。

灵活创新的变通精神，主要是指新浙商时刻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抢抓机遇、抢占先机、灵活多变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浙商抓住了一个个发展机遇，赢得了发展时间，先行一步走向市场经济，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先发优势。在创新中，敢于探索，争喝“头口水”，出现了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第一个在海外开发专业市场……浙商的果断决策也促成了专业市场的红红火火，私营企业的发展成燎原之势，国有企业早早地展开了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在改革中善于随机应变，趋利避害。从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力最弱的领域启动和推进，进行渐进式的增量改革，不搞一步到位的破旧立新，尽可能减少社会震动和阻力。

抱团合作的团队精神，主要是指浙商内部相互之间的团结、协作与配合的集群形象。改革开放以后，浙商的集群式发展模式正是基于家族纽带以及由此衍生的泛家族主义发展起来的。通过亲戚关系与泛家族关系（朋友、同乡、认亲等模式）进行群体性创业，进行集群性跨区域发展。因此，这种合作与配合并非只是基于市场竞争而相互博弈的结果，而是基于地域性和亲缘性基础之上的一种互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地缘为中心、以血缘、业缘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通过文化、习惯、语言和性格的交流得以形成的。通过抱团合作，逐步形成了以地域和行业为纽带的规模商业效应，区域性的商人群体不断涌现和强化。

恪守承诺的诚信精神，主要是指浙商讲诚实、守信誉，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精神气质。浙商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然而，如果不讲诚信，开拓则寸步难行。诚信也是浙商的经营之道和企业之源，是一种能够转化为物质财富的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更是浙商精神的精髓与商法的要则。例如宁波商帮有着近百年的诚信经营传统，他们以“宁可做蚀、弗可做绝”，“诚招天下客、信誉值千金”等经营格言，长期建立了可靠的商业信誉和信用制度，使宁波商帮的盛誉名闻海内外。

此外，浙江各地地方精神的提炼和概括也为当代浙商精神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和有益的参考。历史地看，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巨大的市场需求，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起步，以“开夫妻老婆店”为创业载体，浙江各地都开始了艰辛的创业之路。例如，“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就是当初温州民营企业创业情景的真实写照，在温州人民和企业家们近几十年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凝练出了“敢于冒险，自立自强，永争一流”的温州精神。“有硬气、不张扬、敢冒险、善创造”是台州传统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台州民营企业精神的极好概括，对台州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萧山精神经历了从“围垦精神”，到“四千精神”、“四抢精神”、“四敢精神”的历史发展，最终提炼出了“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本质精神内涵，成为萧山乃至整个大杭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在“拨浪鼓摇出大市场”、“走街穿巷”的历史形态下发展起来的义乌经济，凭借“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闯出了一片蓝天，等等。正是各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共同促成了浙江经济的走在前列，正是各种地方精神的不断发展和充实共同推动了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的丰富和升华。

三、当代浙商精神的新概括和新提炼

新世纪新阶段，浙江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重大任务，当代浙商也面临新的考验。浙商群体在传统浙商精神的基础上，正在以新的精神风貌应对着当前的各种挑战。我们有必要根据新情况、新挑战、新要求，对当代浙商精神作出新的概括和提炼，使其更加准确地反映当代浙商的精神风貌，也使其更能在现实实践中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对当代浙商精神的新提炼和新概括，应该遵循两大基本原则。一是充分展示浙商精神的整体提升和动态趋进。在提炼和概括中，既要注重当代浙商对传统浙商的传承与沿袭，又凸显传统文化基因在新时期的蜕变与发展；既反映创业期艰苦奋斗的“炽烈企业家精神”，又包含守业开拓期的基本特征，充分展示浙商群体的历史传承性、全面整体性、动态提升性。二是牢牢抓住当代浙商精神内涵有机成分，以其为核心，层层推进。当代浙商精神大致涵盖了吃苦精神、隐忍精神、诚信精神、开拓精神、变通精神、创新精神、包容精神、合作精神等要素，这里我们将其统括为“任时敏行，开拓创新，勤奋拼搏，诚信守义，情怀家国，四海为业。”

1、任时敏行

“任”意为“任凭、凭借”，“时”指时机、机遇，“任时”意指善于把握时机和机遇，并与时俱进。“敏行”出自《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意谓君子说话要谨慎，而行动要迅速而灵敏。“任时敏行”意谓着当代浙商精神的内涵首先体现为，浙商群体善于把握时机和机遇，善于与时俱进，能够随着环境和态势的发展变化，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并迅速行动。其具体含义有二：一是审时度势，见微知著，趋时求新。即仔细研究和观察分析时势，估计情况的变化；通过辨别和发现事情的苗头，就能预判其实质和发展趋势；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随时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行动方式，使其观念和行动均能同时代共同进步。二是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善于洞察商情，把握商机。遵循市场规律，主要是对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等基本规律的了解和把握，同时善于从日常生活和细微处洞察商情，在适当的时机和机遇下能够准确判断、把握商机。

“任时敏行”一方面凸显了浙商能够凭借时机、机遇而获得成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其自身判断之精准、反应之迅速、行动之敏捷。这种精神不仅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向上的进取意识和面对客观态势的开放心态，更需要灵敏的商业嗅觉、极强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等重要主观要素。只有同时具备这些心态和素质的商界精英，才能在商海中获得成功，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

2、开拓创新

“开拓创新”意指不断进取，实现由小而大地发展和扩大，同时利用已有的资源和要素实现不断的更新、变革和创造，用新事物替代或覆盖旧事物。当代浙商精神的“开拓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锐意进取，即积极地、意志坚定地追求上进，下决心强化，力图有所作为。其中也体现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始终坚守个人志向和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绝不退缩，不轻易放弃的宗教徒般的虔诚和隐忍精神。其二，敢为人先，即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过程中，敢闯敢干，争喝“头口水”的首创精神。其三，求变求新，即不囿于传统，勇于打破常规旧俗，随着环境态势的变化进行更新、变革和创造。其四，转型升级，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不断实现自身的转型与升级。

3、勤奋拼搏

勤奋拼搏主要描述了当代浙商在创业和守业过程中的吃苦耐劳、严谨低调、求真务实的精神内涵。其内在含义有三：第一，吃苦耐劳、坚毅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第二，认真严谨、不事张扬的作风。意指当代浙商一方面具有踏实醇厚、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的严谨作风，另一方面不事张扬，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低调作风，在行为处事和与人交往上，不虚夸，不自大、不高傲。第三，求真务实，既勇敢追求事物发展的真理所在和寻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又脚踏实地、注重实干、讲求实效。勤奋拼搏体现了当代浙商始终保持着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是在商界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主观要素和精神内涵。

4、诚信守义

“诚信守义”表明了当代浙商之讲诚、讲信和讲义。“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人之立身处世，当以诚为本。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肯定了“诚”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要求人们修德做事，必须效法天道，做到真实可信。说真话，做实事，反对欺诈、虚伪。“信”，则是指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说文解字》认为“人言为信”，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可见，信不仅要求说话诚实可靠，而且要求做事也要诚实可靠，信守承诺。“守义”是指遵从正义、遵守节义或道义。诚信守义主要包括三层内涵。一为以诚待人、以信立本；二为俭约自律、勇于担当；三为中和包容，善于合作。合作精神也称为“抱团”精神，主要体现在发现商机和有利条件之时，往往能够与同一地域或同一行业的商业伙伴共同分享信息与机会，形成有利的规模效应。因此，诚信守义作为当代浙商精神的一大内核，也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

5、情怀家国

“情”，感情，感恩之情、关怀之情、思念之情；“怀”从心，本义为思念，意指心中始终萦系的关心和牵挂。情怀家国的内涵有二：一是爱乡爱国、回报故里。当代浙商无论在本土发展，还是在省外、境外发展，都表现出一种对祖国、对家乡的深厚情感，不论身在何方，都心系祖国和家乡，始终在内心最深处关心和牵挂着祖国和家乡的一草一木，以各种方式、尽最大努力为祖国和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二为施仁布泽，乐善好施。他们不仅立足自身企业，还立足社会，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同时，能够跳出企业自身，不仅以一种有利于企业自身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方式进行经营和管理，更能够以慈善的形式勇敢地承担起关系到整个社会、关系到更长远发展的社会责任。施仁布泽、乐善好施已经成为诸多浙商爱乡爱国、回报故里的一种重要方式。

6、四海为业

“四海为业”凸显了浙商放眼全球、开放图强的眼界和胸怀，以及落地生根、四海为家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在当代浙商群体中，“走出去”的思维模式和不贪恋故土的行为特征非常明显，在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交织背景下，秉承了传统浙商乐于接受新事物、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和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而开拓创新、勤奋拼搏的精神，使得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只要有石缝的地方就能生长，只要有商机的地方就有浙商，最终成就了他们的四海为家和四海为业。这种落地生根、百折不挠的精神也使其在全球范围内都表现出极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浙江企业迅速在全国各地成长起来，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势，在最大范围内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

总的来说，“任时敏行，开拓创新，勤奋拼搏，诚信守义，情怀家国，四海为业”是在围绕当代浙商的根本性精神特征之基础上，层层推进的一种概括与提炼。“任时敏行”是最显著、最具特色的精神内涵，“开拓创新，勤奋拼搏”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前提和要件，“诚信守义”是其安身立命之本，而“情怀家国，四海为业”是浙商群体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和发展的精神内核所在。

四、浙商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内在统一

浙商精神与浙江精神，在文化传承上具有明显的同源性；在承载主体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在内涵要素上具有的一定同质性；在发展态势上具有双向的互动性。因此，浙商精神与浙江精神之间是一种同源共生、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的内在统一关系。

1、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共同孕育于浙江优秀传统文化

历史上的浙江是开发较早、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南宋时还一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是著名的文物之邦。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以人为本观念，工商皆本、义利并重的务实作风，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以及灵活变通、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等文化基因，都为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埋下了优良的种子，使二者文化

传承上具有极大的同源性。

作为区域文化的“两浙”文化，包含了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叠加和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既具有坚韧、刚毅、负重的品性，又有宽容、平和、柔慧的特点，既有闯滩、冲关、冒险的意识，又有守成、从容、适性的传统。在以农耕为主导的文化圈内，相对中原区域的中心地带而言，地处边缘的“两浙”地区（尤其是浙东地区），在物质发展和文化生成方面，都具有一种主动求生存忧患意识和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从而获得了不断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和调适力，推动了自身的文化增殖。不断演化和积淀而呈开放进取的“两浙”地域文化，不仅对当代浙江精神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该区域的商业精英的思想观念、认知方式、文化性格、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心理感悟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2、浙商精神是浙江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脱离不了社会物质经济利益的增长与提升，脱离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程度。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浙江经济的突飞猛进，离不开一批具有浙商精神的商人群体。他们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份子，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既是人民大众，也是商界精英，这种主体的双重属性必然决定了浙商精神作为浙江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决定了浙商精神作为浙江精神在特定人群身上的特殊体现而存在。

3、浙江精神是浙商精神生长、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由于浙江精神与浙商精神具有相同的文化因子和历史传承，因此在内涵要素上具有同质性。无论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还是“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都为浙商精神的生长和发育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求真务实”、“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守志笃行”的浙商精神具有同源共生性，“诚信和谐”与“诚信为怀”具有相似的意义和内涵，“勇于创新”和“图强”的浙江精神则与浙商的“开天掘地”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浙江精神能够为浙商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提供强有力的动力和支撑。

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为浙商精神的提升与完善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动力，使其向更全面、更人文、更和谐的方向发展。虽然二者在本质要素和主要内涵方面均具有同源共生和内在一致的关系，但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看，浙江精神能够延伸至更广的范围。虽然当代浙商身上已经体现出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观念，但浙商精神更主要地体现着的是与浙江精神的经济内涵最直接相关的部分，因此浙商精神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更多的文化内涵为其提供更多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需要更多的政治内涵为其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先进的政治文明作为保障，从而实现全方位的提升与完善。

4、当代浙商精神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着浙江精神

浙江精神的提炼与概括，是以浙江人中最具特色和最有代表性的主体为对象的，因此，浙商群体始终是浙江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各个地域独具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例如温州商人、义乌商人、萧山商人等不同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必然体现出不同的商业文化和精神特质，这些地域性企业家的精神也构成了浙商精神和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提升也必然不断丰富和充实着浙江精神，使其既兼顾各地方精神的个性和差异性，也展现了对现代精神的总体追求。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浙江精神和浙商精神必将成为更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内在精神内涵。